

# “文丐奔竞”之外

——也论“绍兴和议”期间的文学生态

王建生

**内容提要** “绍兴和议”期间，谄谀之风盛行，“文丐奔竞”，这仅是文学生态的一个面相。“山林之士”作为重要的创作主体，他们从朝堂走向山林，持守君子理想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砥砺品节、读书治学、涵养心性，以实际行动践履君子人格。他们的诗文作品，也成为南渡文学中一道亮丽的景观。

**关键词** 绍兴和议 山林之士 君子 文学生态

在“绍兴和议”的二十余年间（1138—1161），宋高宗和秦桧摧残正论、实施高压政治，使得“文丐奔竞”，谄诗谀文汗牛充栋，这几乎成为宋代文史研究者的共识<sup>①</sup>。若将研究的重心从文丐转向“山林之士”，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“弥望皆黄茅白苇”的文学景观。身处山林的忠正之士，虽在政治上受到压制，但他们持守君子理想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读书治学、砥砺节操、涵养心性，形成了士林的另一道风景线。

## 一 从朝堂到山林

在中国古代，隐士文化源远流长。士人隐逸于山水林泉之中，自得其乐，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消极的，甚至是排斥的。本文所谈的“山林之士”，与通常意义上的隐士不同，指的是“绍兴和议”期间被排挤出朝堂的士人。朝堂、山林作为士人活动的场所，本不带有道德评判色彩，但士人从朝堂到山林，不仅仅意味着场所的变化，同时寓示着政治取向、人生重心的转变。朝堂之士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在朝廷中枢机构任职的士人，他们是南渡初年政治、思想、文化建设的主体。绍兴八年（1138）后，围绕和、战之争，朝堂之士开始分化，主战者很快被排挤。这一现象引起了后世的关注，这批被排挤出朝堂的士人，被冠以“山林之士”的称号。比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正月，和州进士何宋英向宋高宗上书时，写道：

自秦桧误国以来，奸臣相继专党擅权，无所不至……遂令天下之忠臣义士抚膺扼腕，相视切齿，高举远引，甘心自弃于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。或佯狂于闾阎，或飘蓬于江海，或慷慨而悲歌，或如痴而似醉，至于郁郁而病、愤愤而死者多矣。臣于是时，进退不能，自知无用，不免土木其形骸，水云其心志，隐于岩石泉水之下，处丰草长林者三十年矣。<sup>②</sup>

何宋英的上书中，“忠臣义士”已带有浓重的道德评判色彩，“甘心自弃于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”、“或

<sup>①</sup> 王曾瑜《宋高宗“文丐奔竞”一节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05页；沈松勤《从高压政治到“文丐奔竞”——论“绍兴和议”期间的文学生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3年第3期；钱建状《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》“谄谀之风——文字狱的另一面”一节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02—208页；等等。

<sup>②</sup>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（以下简称《会编》）卷二二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630页。

佯狂于闾阎，或飘蓬于江海”、“隐于岩石泉水之下，处丰草长林”等，都是对“山林”生活极其形象的描绘。

史学家李心传明确地使用“山林之士”这一称呼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对绍兴秦桧专权有如下评论：“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，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，则不得仕宦；忠正之士，多避山林间。”<sup>①</sup>李心传对绍兴和议期间士林的风貌作了一些概括，那便是“忠正之士，多避山林间”。此外，他还对秦桧卒后的思想文化态势有这样的评判：“自秦桧死，学禁稍开，而张忠献公（按，指张浚）为桧所忌，谪居连、永间者，十有余年，精思力行，始知此学为可用。然桧之余党，相继在位，国论未正也。惟山林之士，不以荣辱贵贱累其心。”<sup>②</sup>李心传所用的“山林之士”，即是“忠正之士，多避山林间”的简称，包括秦桧死前的身处山林的士人；而且，他还揭示了“山林之士”的人格魅力，“不以荣辱贵贱累其心”，这也恰恰是“山林之士”的典型特征之一。

“绍兴和议”引发了“道义”、“功利”的争论；且大批朝堂之士从政治中心走向边缘，即从朝堂走向山林。绍兴八年（1138）末、九年（1139）初，朝臣中反对和议的声势最为高涨，阵容也极为庞大。吕中《大事记》在总结这一事件时，列举了多达三十七人的名单，引次如下：

桧虽以和议断自圣衷，而人心公议，终不可遏。争之者，台谏则张戒、常同、方庭实、辛次膺，侍从则梁汝嘉、苏符、楼炤、张九成、曾开、李（当为“张”）焘、晏敦复、魏玘、李弥逊，郎官则胡理、朱松、张广、凌景夏，宰执则赵鼎、刘大中、王庶，旧宰执则李纲、张浚，其他如林季仲、范如圭、常明、许沂（当为“忻”）、潘良贵、薛徽言、尹焞、赵雍、王（当为“冯”）时行、连南夫、汪应辰、樊光远，交言其不可，大将岳飞、韩世忠亦深言其非计。而胡铨乞斩王伦、秦桧、孙近二疏，都人喧腾，数日不定，人心亦可知矣。<sup>③</sup>

反对和议的士人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以“义”事君；这也是君子的理想、职责所在。他们认为朝廷若屈辱地议和，无疑陷君王于不义。例如，范如圭便以《春秋》大义责秦桧，云：“相公尝自谓我欲济国事，死且不恤，宁避谤怨。相公之心则忠矣，使杀身而有益于君，固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。若犯众怒，陷吾君于不义，政恐不惟怨谤而已。将丧身及国，毒流天下，遗臭万世。”<sup>④</sup>胡铨上疏反对和议时，也言：“义不与（秦）桧等共戴天。”<sup>⑤</sup>早在绍兴八年（1138）初，秦桧就开始为和议做准备，派遣王伦到金国请和，辛次膺认为：“国耻未雪，义难请好。”<sup>⑥</sup>辛氏在阐明立场时，关键词便是“义”字。

为平息朝臣反对和议的声浪，秦桧极尽拉拢、排挤之能事，以分化朝臣。秦桧实施和议政策的举措之一，便是举荐素有威望的李光作参政；在他看来，李光“有人望，若同押榜，浮议自息”<sup>⑦</sup>。李光出任参政不到一个月，朝廷便下达了和议诏书。贬居永州的张浚，给孙近、李光写信，阐述“义”不当和的立场。明州监当官杨炜也给李光上书，极言和议之非，并责备李光不该附和秦桧，贪图名利。杨炜的《上李光书》，内容极其丰富，它不仅反映了南渡士人对政治形势的判断，还表达杨炜对宰执重臣的希望——以“道义”事君。书信的内容节引于下：

某虽碌碌庸众，浮沉里巷，然亦已钦慕阁下信刚，决君子人也。……人情汹汹，弥时不定，遽闻阁下奏召造朝，天下之人与夫贤士大夫欣欣然皆颂阁下……尚妄意阁下靖康之朝，挺挺之节固在，履此危机，正昔所谓有待而发者，庶几能为圣主开陈存亡利害之势，维持善后之策，尽识虜诈，洞悟天听，断此国论。不数日，阁下既至，遽复合为一党，寂然无声。有识者谓阁下非不

①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要录》）卷一六九，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条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2771页。

② 《道命录》卷五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③ 《要录》卷一二四，绍兴八年十二月引，第2029页。

④ 《要录》卷一二三，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条，第2003页。

⑤ 《宋史全文》卷二〇，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条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元刻本。

⑥ 《要录》卷一一八，绍兴八年正月丙午条，第1901页。

⑦ 《要录》卷一二四，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条，第2011页。

知利害之晓然，所以然者，卖谄取执政尔。已而果然，於戏！利禄之移人，一至是邪！……若阁下果独不知之（按，指和议），是不智也。倘阁下知不可和，徒媚宰相取尊官，遂噤默而不以告吾君，是不忠也。为大臣而不智不忠，果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乎？……安有身为大臣，坐视君上贬屈尊称臣于丑虏，恬不为恤诸。公世事儒业，号为知书，此岂平昔所学于圣贤致君之事业哉？……犹冀阁下尚能改悟，力解社稷之祸，挈而置之安存。不然，不得其职，自可引身而去矣！岂可与卖国之奸谀，甘心低头，共槽枥而食邪？<sup>①</sup>

在书信中，杨炜始终以“君子”的标准来要求李光；而且，“为圣主开陈存亡利害之势，维持善后之策，尽识虏诈，洞悟天听，断此国论”，是南渡士人的外王理想。不仅杨炜这样要求李光，胡安国亦以“国论未定，正要博谋。若赞得国是，其绩不小”激励胡寅<sup>②</sup>。无论是“断此国论”，还是“赞得国是”，都体现了君子任其责的精神，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诉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杨炜对李光的要求，体现的依然是一种传统的观念：道合则进，不合则去。在杨炜看来，李光没有做到这一点——未能向宋高宗力谏和议之危害，也没有引退，原因便是他贪恋名位。杨炜书信中体现了两种政治理想：一种为道义，一种为功利。重道义，还是重功利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取向与行为选择，这是朝堂之士分化的根源所在，也是此后朝堂之士与“山林之士”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。

面对秦桧对朝堂之士的威逼利诱，不少士人坚持立场，以道义为重，保持人格的独立。绍兴八年末，秦桧极力拉拢张九成站在自己的阵营。据《要录》记载：

秦桧谓九成曰：“且同（秦）桧成此事，如何？”九成曰：“事宜所可，九成胡为异议，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！”他日，与吕本中同见桧，桧曰：“大抵立朝，须优游委曲，乃能有济。”九成曰：“未有枉己而能正人。”桧为之变色。<sup>③</sup>

在同秦桧周旋的过程中，张九成表现出了十足的聪慧与果决，“未能枉己而能正人”一语，直承孟子“枉己者，未有能正人者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之意，实乃以道义相高的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。魏玘不愿做金国的馆伴使，秦桧问他不主和议的原因，魏玘认为“敌情难保”，并批驳秦桧所谓“以诚待敌”之策，云：“相公以诚待敌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！”<sup>④</sup>魏玘此举，其实已为他日后的政治选择埋下了伏笔——因不赞成和议被排挤出朝堂。

在拉拢朝臣的同时，秦桧将不附和议者相继排挤出朝堂。如绍兴八年十月，林季仲知婺州，中书舍人吕本中罢任<sup>⑤</sup>；绍兴九年正月，曾开知徽州，李弥逊知漳州；三月，胡理知严州，吕用中知建州；四月，晏敦复知衢州，潘良贵知明州；五月，汪应辰通判建州<sup>⑥</sup>；绍兴十年三月，朱松知饶州；闰六月，胡寅知永州，廖刚外任；八月，张九成、喻樗、陈刚中、凌景夏、樊光远，与外任差遣<sup>⑦</sup>。

宋高宗、秦桧对异议之人的处理意见很明确：“今者和议，人多异论，朕不晓所谓，止是不恤国事耳！若无赏罚，望其为国实难。自今用人，宜求靖共之操，如其不然，在朝廷者与之外任，外任者置之闲散，闲散而又不靖者，加以责罚，庶几劝惩，不至专为身计。赏罚既行，数年后，可望风俗丕变矣！”<sup>⑧</sup>宋高宗和秦桧对待破坏和议的士人决不留情的态度，表明他们为实现“一道德而同风俗”的目的而不

① 《会编》卷一九一，绍兴九年正月十四日，第1377—1382页。《要录》卷一二五，绍兴九年正月乙未条，乃节录文字（第2040—2041页），《会编》所收乃书信之全文。

② 《要录》卷八五，绍兴五年二月丁亥条，第1399页。

③ 《要录》卷一二三，绍兴八年十一月丙戌条，第1980页。

④ 《要录》卷一一九，绍兴八年五月辛亥条，第1931页。

⑤ 分别见于《要录》第1972、1977页。

⑥ 分别见于《要录》第2039、2045、2061、2068、2071、2077页。

⑦ 分别见于《要录》第2157、2190、2206—2207页。

⑧ 《要录》卷一五六，绍兴十七年四月丙辰条，第2530页。



择手段，只要与朝廷唱反调，处置就会越来越重，外任→闲散→责罚。在这种政治生态中，大批士人开始了从朝堂走向山林：要么是外任，要么是闲散，总之，他们不在朝堂之上。李光参政刚一年，就因与秦桧不合被罢政<sup>①</sup>，成为“山林之士”中的一员。

## 二 “山林之士”的群体特征

“绍兴和议”期间被贬斥、迫害的士人大体上可归为两类：不附和议者；忤秦桧得罪者。这两类人构成了“山林之士”的主体，而对于“忤秦桧得罪者”，应当加以辨别，如李光、廖刚在秦桧专权时期的表现，无愧于“君子”之称呼；他如萧振、程敦厚、张嶠、郑仲熊、杨愿、李文会等，甘愿充当秦桧的党羽，陷害忠臣义士，无异于势利小人，故不在本文论述之列。

“山林之士”作为一个群体，显得很松散。从朝堂走向山林后，他们多散布在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广东（包括今海南）等地，其中又以福建、江西最为集中。有些成员的流寓地比较固定，比如曾几在上饶（今江西上饶市）、李弥逊在连江（今福建连江县）、张九成在南安军（今江西大余县）；不过，像赵鼎、胡铨等人，辗转于福建、广东等地，还曾在海南岛上寓居过。“山林之士”的流寓地虽然很分散，但身处山林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，大体上开始于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止于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秦桧卒后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山林之士”的年龄跨度虽很大<sup>②</sup>，但大都对北宋徽宗朝的政治、思想文化政策有切身的体验，又经历了靖康之难、宋室南渡。在他们的认知世界中，很自然地将北宋后期蔡京、王黼专权与眼下的秦桧专权联系在一起。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十月秦桧卒后，“山林之士”对于秦桧专权的这段历史，有很犀利的评价，如胡寅写给张九成的信中说：

会之（指秦桧）踵荆舒（指王安石）后尘，以蔡京、王黼为标准，以耿南仲、李邦彦为宗派，其所愿欲，几青出于蓝矣。溘然遽死，遗臭奈何！向以得君之专，行政之久，依仿先民事业，岂但小康东南，固可开拓河北。乃僻经反道，迷误本朝。若非天佑宋室，剿绝其命，滋长祸乱，何止于焚书坑儒而已。<sup>③</sup>

胡寅、张九成等南渡士人对蔡京、王黼弄权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，对比刚刚过去的秦桧专权，发现两者竟如此相似！这种相似，加剧了君子、小人之辨，上引书信中胡寅将王安石、秦桧并提，便是最明确的信号。他们将北宋后期应对困境的经验不自觉地运用到当下，这就使得“绍兴和议”期间的历史在“山林之士”那里具有先验性，即政治形势、思想文化态势是可预见的。在对他们行实的考察中，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自信，这种自信的来源之一，便是他们业已熟稔的北宋社会阅历。

秦桧专权时期，一些文人丧名失节，甘当秦桧的党羽。如葛立方曾上奏云：“伏望特降诏旨，申敕臣工，使之精白一意，上承休德，如有怀奸弗靖，煽惑士流者，令御史台觉察，流之四裔，永为臣子不忠之戒。”<sup>④</sup>张嶠为秦桧讲和出谋划策，进献《中兴复古诗》<sup>⑤</sup>；朱敦儒为其子谋官而苟同秦桧父子，“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，故其节不终”<sup>⑥</sup>，等等，终为人所诟病。在“山林之士”看来，秦桧当权后，“能成事君子，往往去之，与之尽力者皆可知矣”<sup>⑦</sup>，便隐含了君子退而小人进的意思。他们对当下士

① 《要录》卷一三三，绍兴九年十二月辛亥条，第2141页。

② 以绍兴八年（1138）为例，其中的年长者已六十岁左右，比如晏敦复（1075—1145）、李光（1078—1159）、王庭珪（1080—1172）等人；年龄较小者像汪应辰（1118—1176）也就二十来岁。

③ 《答张子韶侍郎》，《斐然集》卷一八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，第389页。

④ 《要录》卷一五一，绍兴十四年五月丁卯条，第2436页。

⑤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一《本朝五·中兴至今人物上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145—3146页；《宋史》卷四四五《张嶠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3140页。

⑥ 《宋史》卷四四五《朱敦儒传》，第13142页。

⑦ 《横浦心传录》卷上，明万历年间吴惟明刻本《横浦先生文集》附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气不振有清醒的认识,张九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:

大抵人材,在上之人作成。若摧抑之,则此气亦索。若道义之士,不任其事,安肯自取僇辱?

秦公排斥异己,大起告讦,此其志欲杀僇贤者,未必不反激人之言。子姑俟之。<sup>①</sup>

张九成此论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:人材在于朝廷精心培育,而朝廷若摧残打击士人,必然导致士气衰索;道义之士,暂时远避山林,不任其事,但心忧社稷天下;秦桧排斥异己,迫害忠正之士,不仅打不垮他们的精神志气,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拨乱反正。这是极有远见的判断,从这一判断中,足见“山林之士”的自信。

不独张九成,王庭珪也有类似的预见。被贬至辰州后,他写有《留别黄子默》,诗云:“回瞻人在斗南边,目断湘中万里天。驱马又过衡岳寺,携家却上洞庭船。江湖足了平生事,文字岂徒今世传。不共离亭一樽酒,行看待我着归鞭。”<sup>②</sup>诗中“文字岂徒今世传”,传达出王庭珪的自信,话外之意,相信历史会给其正义行为以公正评判。在辰州得知秦桧死亡的消息后,王庭珪写诗道:“辰州更在武陵西,每望长安信息希。二十年兴缙绅祸,一朝终失相公威。外人初说哥奴病,远道俄闻逐客归。当日弄权谁敢指,如今忆得姓依稀。”<sup>③</sup>慨叹近二十年中士大夫所受的祸患,强调秦桧“弄权”,其实也就是为“山林之士”正名。

在“绍兴和议”期间,和战之争是明线,而君子、小人之辨则是暗线,两条线索相互交错,这就使得绍兴和议之后的政治、思想文化局势极其复杂。和、战之争,是南宋朝野上下面临的新课题;而君子、小人之辨及其变体,即“邪”、“正”之分,则是北宋中后期以来一直牵动士大夫神经的老话题。在君子、小人之辨的语境中,“山林之士”往往以君子自期,在心理、学养、道德境界、人格等方面,与暂时得势专权的小人展开较量。

在胡铨的思维世界中,主张和议者就是小人。他在隆兴二年(1164)八月上疏中说得很明白:“自靖康迄今,凡四十年,三遭大变,皆在和议……而争言为和者,是有三说焉:曰偷懦,曰苟安,曰附会。偷懦则不知立国,苟安则不戒鸩毒,附会则觊得美官。小人之情状,具于此矣。”<sup>④</sup>胡铨作为反和斗士,赢得后世的景仰。他作为正人君子的形象,也更加凸显,正如张浚所说:“秦太师专柄二十年,成就邦衡(按,胡铨字)一人耳!”<sup>⑤</sup>

张九成在为刘安世《尽言集》作序时,对北宋中后期君子、小人分野的历史作了总结:“司马温公与王介甫清俭、廉耻、孝友、文章为天下学士大夫所宗仰,然二公所趣则大有不同,其一以正进,其一以术进。介甫所学者申、韩,而文之以六经;温公所学者周、孔,亦文之以六经,故介甫之门多小人,而温公之门多君子。温公一传而得刘器之,再传而得陈莹中。介甫一传而得吕太尉,再传而得蔡新州,三传而得章丞相,四传而得蔡太师,五传而得王太傅(王黼)。介甫学行,使二圣北狩,夷狄乱华。呜呼!悲夫!器之在谏垣,专攻王氏党,其扶持正道,亦云切矣。余虽不及识其人,读其遗稿,徒深慨叹而已。”<sup>⑥</sup>将元祐前后司马光、王安石之门人的传承,作为君子、小人分野的起点,是张九成等人的共识。这种识见恰好是在邪正之辨、君子小人之分的语境下展开的。《尽言集序》约作于绍兴十六年(1146)前后。秦桧及其党羽欺上罔下的作为,尤其是对忠义之士的迫害,已构成了新一轮的君子、小人之辨,张九成只不过借对历史的复述来映射现实而已。

即便身处山林,也不忘朝堂,砥砺品格,直道而行,这是“山林之士”又一典型特征。“绍兴和

① 《横浦心传录》卷中。

② 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一六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4册影印明嘉靖五年刻本。

③ 《辰州僻远乙亥(1155)十二月方闻秦太师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诗悲之》,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一六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七四《胡铨传》,第11586页。

⑤ 杨万里所撰胡铨《行状》,《杨万里集笺校》卷一一八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4501页。

⑥ 《尽言集序》,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六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宋刻本。

议”期间，不少士人对“山林”有亲身体悟。从刘子翬《夜行潭溪上念原仲致中乔年茂元伯达皆有人山期以诗趣之》<sup>①</sup>可以看出，胡宪、刘勉之、朱松、范如圭（字伯达）、傅茂元等人，绍兴和议之后相继退避于山林；可与李心传“忠正之士，多避山林间”的概括相印证。退居山林的文人，坚决不与秦桧之党合作，体现了仁人志士的骨气与豪情。绍兴八年四月，吕本中称赏刘勉之“行义志业”，并极力荐举他，故朝廷召他赴行在，“秦桧方主和，虑（刘）勉之见上持正论，乃不引见，但令策试后省给札而已。勉之知不与桧合，即谢病归。杜门十余年，学者踵至，随其材品，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”<sup>②</sup>。刘勉之等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悠然山林，砥砺品节，并培养了新生力量，如朱熹在绍兴时期曾受学于刘勉之、胡宪、刘子翬等人，在学术、品格、气度等方面都为此后的集大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潘良贵竭力摆脱秦桧之牢笼，砥砺君子节操，在当时即获得同侪的称许，据《横浦心传录》记载：“先生因云潘子贱（即潘良贵）舍人，老来力量持重。见渠作《三戒说》，皆是履践语。秦公势正炎炎，冷处一角，笑数泉石。秦公虽令人致语，亦不答。家甚贫，处之晏然，古君子也。闻其死，吾亡后友也，不觉为之堕泪。”<sup>③</sup>从张九成谈及潘良贵时的语气、神情来看，二人可谓声气相通，志趣相投。吕本中、曾几在“绍兴和议”期间，同样坚守品节，矢志不渝<sup>④</sup>。“山林之士”砥砺品节的行为，保证了“道”的庄严与纯粹，起到了端正人心、分辨邪正的作用，与浮薄衰索的朝堂士风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有志之士自觉地退避山林，这是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。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世界中，士人应当以“道”事君，道合则仕，不合则退。无论进退，都应当正道直行。张九成指出：“山林之士忘进，市朝之士忘退，皆非见道，进退无意而唯其正则善矣，才忘则必偏，偏必病。”<sup>⑤</sup>这简直是张九成的夫子自道；“唯其正”而从，直道而行，乐在其中，可以说是“山林之士”的共识。李光于绍兴十年（1140）触忤秦桧，贬谪岭南，自号“读易老人”，在《读易详说》中，“于当世之治乱、一身之进退，观象玩辞，恒三致意”，在解《否》卦之初六时说：“小人当退黜之时，往往疾视其上。君子则穷通皆乐，未尝一日忘其君。”<sup>⑥</sup>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胡寅退居南岳，曾这样描述他的山林生活：“栽花为事业，种秫是谋猷。不羡两蜗角，从教双鬓秋。登楼山抹黛，垂钓水澄眸。此乐应谁侣，鸾凤昔从游。”<sup>⑦</sup>身处山林，却深怀庙堂之思，“栽花为事业，种秫是谋猷”，把山林当作了庙堂，修齐治平之愿望不自觉地流露在诗歌中，表明他并未放弃“外王”理想；尾句则将山林之乐，提升至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”的境界。

“山林之士”在对进退出处的思索中，形成基本的认知：无论是进还是退，都可以持守“道”，尤其是远离庙堂，更应当在“内圣”方面下工夫。在退处山林的状态下，他们精研性命之理，实际上将视线及个人的精力转移到幽眇的内心世界，以此获得心灵的充实和境界的提升。绍兴和议后，“山林之士”面临困境不尽相同，应对方法也都不同，但在尽力保持心理的平衡、加强心性修养方面是相通的。

赵鼎的贬谪地，由潮州到吉阳军（今海南），一次比一次荒凉，但他竭力保持内心的宁静高远。其《山中书事》云：“心远身闲眼界清，潇然回首万缘轻。更将满耳是非语，换作松风溪水声。”将是非言语涤除，换做松声、溪水声，在自遣中可以看出其豁达的心胸。又《梦觉》：“虚窗午夜月朦胧，推枕萧然百念空。更问幽人洗心法，二年魂梦水声中。”<sup>⑧</sup>所谓“洗心法”，亦重在心灵的调适。

李弥逊归隐福建连江西山，或赋诗饮酒，或笑傲山林，如《初到连江和林公掖先辈》：“投老身名

① 《屏山集》卷一三，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42册影印明刻本。

② 《宋史》卷四五九《刘勉之传》，第13462页。

③ 《横浦心传录》卷上。

④ 韩元吉《两贤堂记》，《南涧甲乙稿》卷一五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⑤ 《横浦心传录》卷中。

⑥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《读易详说》提要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14页。

⑦ 《和洪秀才八首》之五，《斐然集》卷五，第115页。

⑧ 《忠正德文集》卷六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1128册，第723页。



信陆沉，欲将白发寄遥岑。赋诗未敢施彭泽，抱瓮真堪友汉阴。江面飞桥夸壮丽，山腰卧石闷幽深。公才清绝参奇观，慰我长年去国心。”<sup>①</sup>在努力寻求应对困境的精神支柱的同时，李弥逊还竭力激励同僚调适心理。据《宾退录》记载，胡铨被贬至新州，李弥逊书十事以赠：“一曰有天命，有君命，不择地而安之；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；三曰名节之士犹未及道，更宜进步；四曰境界违顺，当以初心对治；五曰子厚居柳筑愚溪，东坡居惠筑鹤观，若将终身焉；六曰无我方能为大事；七曰天将任之必大有摧抑；八曰建立功名，非知道者不能；九曰太刚恐易折，须养以浑厚；十曰学必明心，记问辨说皆余事。”<sup>②</sup>李弥逊所言十事中，其中六条（二、三、四、八、九、十）与修德养心有关，可见在秦桧专权期间，心性修养已成为“山林之士”的要务。“山林之士”对于心性修养等内在品格分外看重，表明心性之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，传播范围也由此扩大。心性之学之所以在绍兴和议期间得到强化和发展，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“山林之士”普遍认为：在当下士风衰索的环境中，只有坚守“内圣”阵地，才有可能在未来的“外王”活动中有所开拓。

### 三 “山林之士”的诗文写作

在探讨“山林之士”的文学写作之前，有必要对“文丐”们的创作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。处于高压政治下的权力中心，朝堂之士参与到歌功颂德的热潮中，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谄诗谀文。若遇秦桧生日，“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，莫不相与歌诗，以纪盛德而归成功。篇什之富，灿然若云，至于汗牛充栋，不可纪极”<sup>③</sup>。沈松勤先生对此有精要的概括：创作主体的心灵畏怯，创作锐气顿失；主题集中于歌颂宋高宗和秦桧“共图中兴”的盛德；弃“刺”尚“美”，唯“德”是颂的文学主张，等等<sup>④</sup>。同样处于高压政治之下，“山林之士”的创作情况如何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文学追求呢？

“山林之士”所采用的文体不一，或诗歌，或题记，或书信，或语录；这些纷繁多样的文字，却有着共同的主题倾向——抒写山林之乐、践履君子人格。这与“文丐”们创作的以歌功颂德为主题的谄谀之作有天壤之别。

与朝堂之士相比，“山林之士”的生活显得很闲散。他们的诗文作品，体现了山林闲居之乐。王庭珪在《和余教授》中表达了穷通皆乐的观念：“词高云蔼蔼，笔扫阵堂堂。妙绝江南社，清新乐府章。穷通元自乐，身世两相忘。不下千寻海，焉能得夜光。”<sup>⑤</sup>曾几寓居茶山的生活，充满了闲淡之趣。《横碧轩》诗云：“道山心已灰，但有爱山癖。移家过溪住，政为数峰碧。空蒙梅子雨，了不见颜色。朝来忽献状，欣若对佳客。晴窗卷书坐，葱翠长在侧。似为神所怜，持用慰岑寂。会登此山头，却望水南北。烟树有无间，吾庐应可识。”<sup>⑥</sup>徜徉于溪山之胜中，或晴窗读书，或登山望水，其乐无穷，尾句“烟树有无间，吾庐应可识”，又有陶潜诗的闲澹之意。“山林之士”所追求的“闲”，关键在于闲远的心境。张九成以“山中人”<sup>⑦</sup>自居，从其在南安的诗来看，读古人书，师法圣贤，远离名利与纷争，安贫乐道，山林之乐尽在其中。如《十九日杂兴》之一：“不是南方热，爱此有永日。人事断经过，萧然空一室。

① 《筠溪集》卷一六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1130册，第742页。

② 赵与峕《宾退录》卷一，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139页；又见于《筠溪李公家传》（《筠溪集》附）。

③ 周紫芝《时宰生日乐府四首》序，《太仓稊米集》卷二五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1141册，第169页。

④ 《从高压政治到“文丐奔竞”——论“绍兴和议”期间的文学生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3年第3期。

⑤ 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一〇。

⑥ 《茶山集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诗题下原有小注：“几尝居孔雀僧院东庑小室，榜曰横碧轩，有诸公唱酬之作。”

⑦ 《游尘外亭呈妙喜老师陈元器郑叔茂沈季诚》云：“我本山中人，推出尘寰里。鸟囚不忘飞，今日乃来此。”（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）该诗作于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二月。

风惊窗外竹，声如清庙瑟。西塘荷已花，北户枣亦实。仕途非所长，进寸辄退尺。所以入市朝，愁苦甘首疾。谪来已九年，底事无忧色。山林兴甚长，湖海情何极。”<sup>①</sup>在自然山水中陶冶性情，寻求生活乐趣。在《竹轩记》中，张九成以竹之风节气韵自比，不“以窜逐为耻”，以“游心为贵”：

今夫竹之为物也，其节劲，其气清，其韵高，冒霜雪而坚贞，延风月而清淑。吾诵书而有味，考古而有得，仰首而见，俯首而听，如笙箫之在云表，如圣哲之居一堂，爽气在前，清阴满几，陶陶然不知孰为我，孰为竹，孰为耻，孰为不耻，盎盎如春，醺醺如醉，子亦知此乐乎？<sup>②</sup>

徜徉于精神的极乐世界中，“山林之士”抛弃世俗名缰利锁的羁绊，心游八极，思接千载。在退隐山林的状态下，他们不以贬谪窜逐萦怀，在山林这片乐土上，构建自足自乐的小天地，从而实现精神的遨游和品格的提升。

读书成为“山林之士”的生活方式，常常伴有自得之乐。曾几、吕本中、张九成、胡寅、刘子翬等人的“读书”诗，就明确地体现了这一旨意：读书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必要途径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，他们汲汲于读古人书、尚友先贤等活动中。将读书视作成圣成贤的有效途径，在书中可以尚友古人，将先贤的道德价值，内化为个体性的道德体认，以此砥砺君子品格。绍兴和议之后，曾几寓居上饶茶山长达七年，在此期间，他常常闭门读书，“隐几读书长竟夕，闭门觅句可忘年”<sup>③</sup>，幽居读书竟到了忘我的地步。《读书四首》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圣贤工夫的追求，其中的第三首写道：“朝游夕咏一窗书，只要今吾胜昔吾。未识此间真气味，直缘圣处少工夫。”沉浸于书中，朝诵夕咏，“今吾胜昔吾”，日新日进，此乃圣贤工夫的真谛。吕本中《读书》，描述其晚年读书状况：“老去有余业，读书空作劳。时闻夜虫响，每伴午鸡号。久静能忘病，因行得出遨。胡为良自苦，膏火自煎熬。”<sup>④</sup>读书常至深更半夜，目的在于追求心灵之澄澈、精神之遨游。

“山林之士”痴心于读书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研讨圣学，师友圣贤，学习做人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君子。“山林之士”在“读书”诗中明此心志，警人戒己。张九成《读书》其一：“伊余生三吴，窜逐落荒外。大目试环顾，四海等一芥。谁能于其间，清浊分泾渭。含菽亦饱满，食檠有余味。不羨嵇叔夜，左右持酒蟹。大哉黄卷中，日与圣贤对。”<sup>⑤</sup>不羡慕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嵇康，而是在书册黄卷中研讨圣学，与圣贤相对，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。在写给常同的信中，张九成交待了自己以读圣贤书为乐事：“宴坐焚香，读圣贤书，乃知闲居之乐，大胜它事。”<sup>⑥</sup>在此期间，他写成《论语解》、《孟子解》<sup>⑦</sup>等。在给陈开祖的信中，还说：“闻见所得，不如践履之深……须一一自己胸襟流出。”<sup>⑧</sup>通过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所蕴含的圣贤精神的亲证亲悟，实现人格精神的提升。寓居衡山的胡寅亦云：“了无歌吹娱宾从，只有诗书养性情”<sup>⑨</sup>；“玩意诗书千古乐，放怀天地一身闲”<sup>⑩</sup>。刘子翬的诗歌同样体现了读书之乐，如“黄卷箠中昆友，白醪杯里圣贤。我愿长闲足矣，人怜独处萧然”<sup>⑪</sup>，对书卷的偏爱，源于尚友古圣先贤的渴望。

① 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二。

② 《竹轩记》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七。

③ 《即事》，《茶山集》卷四。

④ 《东莱先生诗集》卷一七，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，第4册，第11页。

⑤ 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。

⑥ 《与常子正中丞书》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八。

⑦ 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，《郡斋读书志校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098页。

⑧ 《（与）陈开祖》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八。

⑨ 《题叔夏乐谷》，《斐然集》卷四，第83页。

⑩ 《和唐坚伯留题庄舍》之二，《斐然集》卷四，第102页。

⑪ 《六言二首》其二，《屏山集》卷一五。



在政治生态对忠正之士极其不利的情况下,“山林之士”依然在诗文中以节义相激励、以君子相期许,形成一股迥异于“文丐奔竞”的文学风貌——诗文中洋溢着凛然不可犯的精神气象。张九成贬居南安时,给弟子汪应辰写了一首诗:“美玉藏精璞,明珠媚深渊。天清气或朗,光景露涓涓。或者辄按剑,奇才叹难全。之子英杰人,声名何轩轩。妙龄魁四海,终始皆称贤。过眼不再读,悟心非口传。文真翻手成,识超余子先。森森列五岳,浩浩朝百川。谓年未三十,当握造化权。陶甄到唐虞,修洁偕渊骞。谁云一戢翅,沉滞十二年。众论今未谐,子心方藐然。磨砭尽箭鏃,刮洗成混圆。上造羲轩外,下极宣政前。讨论分本末,钩赀穷由缘。遥遥数千载,恍然落眼边。斯文天其兴,子能常蹶颠。试看桃李花,三春何暄妍。未及瞬息间,飘零堕风烟。青青乔松枝,霜雪弥贞坚。子如识此理,聊卧白云巅。”<sup>①</sup>该诗体现了“山林之士”对道义的持守:正人君子不附和议,相继罢官、被贬,张九成激励汪应辰韬光养晦,在上至羲皇、下至本朝宣政间的典籍文献中探究源流、分别本末,以悟得古学之真谛;经历一番磨砺后,不仅学养大为提升,品节也更为坚贞,犹如霜雪压不倒的青松一样。张九成的这首诗,不啻为秦桧专权时期山林之士的座右铭,其精神导向意义不容低估。

同处高压政治之下,胡铨与李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,以君子相激励。绍兴二十年(1150)三月,陆升之、曹泳告发李光父子私纂史籍,李光“永不检举”,其子孟坚“特除名,峡州编管”<sup>②</sup>。私史案之后的李光,并没有消沉。在《与胡邦衡书》第九书中,李光说道:“况吾二人已逾一纪,天道好还,但力行一‘忍’字。”《与胡邦衡书》第十七云:“惟祝乘此闲放,尽为己之学,至处忧患之际,则当安之若命,胸中浩然之气未尝不自若也,邦衡岂俟鄙言?”又:“况君子无入而不自得,想琴书自娱,不知身在万里外也。”在患难之中,首先要安心于贫困,平日所养浩然之气,刚好派上用场。他们不自觉地加强心性修养,忘记世俗的荣辱利害。从李光的书信来看,二人共同关注的是在患难中如何持守君子人格,或力行“忍”字,或为“为己之学”,或君子自得,或陶然自乐。李光、胡铨有意追寻胸中气象,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,充盈于诗文作品中,体现出一往直前的英豪之气。李光羁旅纪行诗之中流露出的精神气象,便是绝佳的证明,如《游石桥三绝》之二:“此身游走半尘寰,赢得颜衰两鬓斑。要是胸中未豪壮,重来海际看涛山。”<sup>③</sup>

除了主题倾向、创作主体精神气象方面的不同外,“山林之士”有意追求平淡深远的文学风尚,与“文丐”们弃“刺”尚“美”、唯“德”是颂的文学主张也截然不同。

两宋之际的文学,反对怨刺的声音不绝于耳,理学家与诗人都一致反对诗文中讥刺的风习。杨时恪守儒家的诗学观:“为文要温柔敦厚,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,温柔敦厚尤不可无。如子瞻诗多于讥玩,殊无恻怛爱君之意。荆公在朝论事,多不循理,惟是争气而已。何以事君?君子之所养,要令暴慢邪僻之气,不设于身体。”<sup>④</sup>黄庭坚也说:“东坡文章妙天下,其短处在好骂。”<sup>⑤</sup>“讥玩”与“好骂”,都不符合儒家诗学本旨。

到了“绍兴和议”期间,反对怨刺的传统被继承下来,无论是文丐,还是“山林之士”,都反对怨刺。王之望《上宰相书》中,便认为屈原、贾谊、孟浩然、石介等在诗文中发抒悲愤不平之气,“露才扬己,上非其君,下讥同列”,并不足取。实际上,王之望的《上宰相书》,“公开提倡歌功颂德,正是要投秦桧所好,为秦桧的文化政策提供理论支持”<sup>⑥</sup>。李光贬居海南后,极力反对怨愤讥骂之文。他有一首长题诗,题曰“海外气候,每岁三、四月间已如剧暑。客有自吉阳至者寓馆,问汉亭累日,且

① 《怀汪圣锡》,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二。

② 《要录》卷一六一,绍兴二十年三月丙申条,第2607—2608页。

③ 《庄简集》卷六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3册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钞本。

④ 《龟山语录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40册影宋本,第516页。该语录乃甲申(1104)四月至乙酉(1105)十月荆州所讲。

⑤ 《答洪驹父书》,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卷一九,《四部丛刊》本,第5册,第23页。

⑥ 钱建状《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》,第237页。

言吉阳气候昼夜如炊，因叹此邦之胜。乃知人生无有足时，不经热恼，岂知平日之清凉乎？故古之达者，每以此对治。……予谪居岭海逾十五年，见闻习熟，不以为异。因作此诗以自慰，且以警世之贱丈夫，一不快即愁叹怨愤，或讥谤怒骂，如柳、刘之徒，盖未足以语此也”<sup>①</sup>。这是李光写自我心境的一首诗，带有励志的性质。诗题本身就是一篇叙事文，海外烟瘴之地气候炎热，经历酷热之后，方知平日清凉时节的可贵，并警告世人：大丈夫应当身经忧患、砥砺品节，而不要像柳宗元、刘禹锡那样稍不顺利就怨愤怒骂。

二者都反对怨刺，但最终的发展路向完全不同：“文丐”们舍弃怨刺，却走上了颂美王政的创作之路；“山林之士”没有停留在“不怨刺”的口头说教上，在如何加强创作主体的内心修养方面更为精深，从而走上了一条融学问、人生、诗文写作于一体的平淡之路。

“山林之士”的平淡观，建立在平和的心境之上。平淡作为宋代文人重要的审美追求，其内涵便是“由苏轼发展了陶渊明的‘平淡’中蕴含的人生追求与梅尧臣‘平淡’中老熟的艺术境界，从而将人生历练与具有宋诗新特征的审美追求结合起来”<sup>②</sup>。到了“山林之士”这里，“平淡”获得更广泛的认同。王庭珪、曾几等人都主张平淡自然的诗歌观念，“诗从平淡人难到，语不雕镌句自清”<sup>③</sup>、“律令合时方帖妥，工夫深处却平夷”<sup>④</sup>，等等，都旨在追求平淡而有深蕴的诗风。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，“山林之士”的诗歌具有平淡深远的意韵。比如，刘子翬《约致明入开善不至二首》之二：“偶临沙岸立多时，淡淡烟村日向低。幽事挽人归不得，一枝梅影浸澄溪。”<sup>⑤</sup>诗歌所体现的闲澹、清雅，无一不是创作主体平和心境的外现；“一枝梅影浸澄溪”，简直是一幅境界澹远的写意画。张元幹在谪居时也保持平和的心境，融化在诗文中，便是醇厚雅正之意，如《兰溪舟中寄苏粹中》云：“气吞万里境中事，心老经年江上行。三径已荒无蚁梦，一钱不直有鸥盟。云收远嶂晚风熟，浪打寒滩春水生。鸿雁北飞知我意，为传诗句濮阳城。”<sup>⑥</sup>此为“山林之士”怨而不露、中正平和的集中体现，后四句结构谨严，意味深长，所有的不平和幽怨尽化在“鸿雁北飞”这一意象中，深合中正平和之旨。暂处山林还可以有效地检验他们心性修养的水平，这种乐观、从容，本身就是心性平和的一种体现。胡寅《谪居新昌过黄黑岭》云：“昔年曾作守，旌旗拥山头。省己无遗爱，投荒历旧游。妻儿相翼卫，风雨漫淹留。力学如何验，仁人乃不忧！”<sup>⑦</sup>

张九成也提倡平淡的文学观，并将平淡的心性与问学之道联系起来，他说：“学问从平淡处得味，方可入道。”<sup>⑧</sup>以人品性情为起点，由心性到学问再到文学，相互关联，形成全方位的平淡观，极大地丰富了平淡的内涵。张九成本人在淡泊心志、修身养性方面更是日新日进，他曾对请教受学的李樗述说了自己的求学心得：“然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非止于务博洽、工文章也，内自琢磨，外更切磋，以求此心，心通则六经皆我心中物也。”<sup>⑨</sup>依据张九成的人生经验，学问也不过是涵养心性的一种手段，“求其放心”，既是求学问道的方式，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状态。当其心性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，触目所及，尽为澄澈无碍的世界，诗云：“深深萧寺足幽居，寝饭行藏亦自如。仰识白云天外意，俯看青史古人书。摩挲方寸生无愧，周览山川气有余。不用棹舟江海去，

① 《庄简集》卷五。

② 马东瑶《走向中兴：南宋绍兴诗歌论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08年第2期。

③ 《和曾英发见寄二首》其二，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一四。

④ 陆游《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》，《剑南诗稿》卷二。

⑤ 《屏山集》卷一八。

⑥ 《芦川归来集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42页。

⑦ 《斐然集》卷五，第121页。

⑧ 《横浦心传录》卷上。

⑨ 《答李樗书》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一八。

清风明月是吾庐。”<sup>①</sup>有此澹泊澄澈之心，放眼物外，尽为晴明之景。学问、人生、诗文，在“山林之士”这里实现了一体化的平淡。

“山林之士”对陶渊明簞食瓢饮、安贫乐道的君子品行进行阐发，张九成诗云：“千载陶渊明，簞瓢常晏如”，“田园爱潜归，簞瓢识颜乐”<sup>②</sup>。在与刘子翬交流人生境界的话题时，胡寅也将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同颜子之乐并提，“人境俱寄陶，陋巷同乐颜”<sup>③</sup>。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与簞食瓢饮的颜回，成为“山林之士”学习的榜样。胡铨谪居新州，筑室城南，名“小桃源”，题诗云：“闲爱鹤立木，静嫌僧叩门。是非花莫笑，白黑手能言。心远阔尘境，路幽迷水村。逢人不须说，自唤小桃源。”<sup>④</sup>从“心远阔尘境”以及“小桃源”的命名可以看出，胡铨对陶渊明式平淡境界的追求。“山林之士”还从诗歌体式上学习陶渊明，因此他们偏爱五言尤其是五古。张九成的《拟古》十三首、《拟归田园》六首，就是他学陶的显证。

“山林之士”还倡导以“德”为本的文学观念。如胡铨在《答谭思顺书》一文中，就极力强调作文要先有盛德，将韩愈“气盛言宜”说，改造成“德盛言宜”<sup>⑤</sup>。王庭珪也认为，明德乃君子的要务：“君子之学当明道德，通经旨，自然学成而名显于时，不必务为雄侈奇怪之文。”<sup>⑥</sup>无论是胡铨还是王庭珪，强调“德”在文学写作中的意义，说到底都是要强化创作主体的道德人格和心性修养。“山林之士”的君子气度以及平淡深远的文学风尚，对中兴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陆游的“养气”说以及诗文中对胸中气象的追寻，杨万里追求胸襟透脱，等等，都是对“山林之士”思想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扬。

秦桧卒后，大批“山林之士”得到平反，不少人重新进入朝廷中枢机构，山林与庙堂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极大地缓解。胡寅《题清远峡山寺》有明确的表露，诗云：“清远峡山寺，几年闻汝名。维舟得眺望，满目慰经行。壁立才天秀，溪间写镜清。岭云方北上，涛雪漫南倾。罪垢三熏净，归风两腋轻。皇慈天共大，睿知日同明。重起阙廷恋，敢怀山水情。生绡无画手，聊此寄真形。”<sup>⑦</sup>该诗作于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，朝堂与山林剑拔弩张的关系得以缓解，“重起阙廷恋，敢怀山水情”二语，道破了绍兴“山林之士”的隐情：身在山林，却心系朝堂。

总之，“绍兴和议”期间，谄谀之风盛行，“文丐奔竞”仅是该时期文学生态的一个面相。面对高压政治，不同的政治抉择、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创作群体——文丐和“山林之士”，也必然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。选择远离政治中心的“山林之士”，持守君子理想，读书治学，砥砺品节，涵养心性，以实际行动践履了君子人格。他们的诗文作品，成为南渡文学中一道亮丽的景观；与“文丐”的谄谀之作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“山林之士”所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，成为乾淳时代思想、文化及文学得以兴盛的生长点。

〔作者简介〕王建生，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。发表过论文《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等。

① 《六月十四日观云有作》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四。

② 《辛未（1151）四月即事》其七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二；《秋兴》其二，《横浦先生文集》卷三。

③ 《和彦冲》，《斐然集》卷二，第33页。

④ 陈郁《藏一话腴》内编卷上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865页，第541页。

⑤ 《答谭思顺书》，《澹庵文集》卷六。

⑥ 《送刘君鼎序》，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三六。

⑦ 《斐然集》卷五，第142页。